

的完整理解，而不是一种几何学式的抽象理解。生态文明同工业文明相比，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在于改变了对人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为什么生态文明跟古老中华文明比较契合？是因为古老中华文明对人在宇宙中地位这一点的认识，与生态文明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跟古老中华文明和生态文明对人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是不同的。我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西方文明或者现代文明自我的理解，有点像是外星人的自我理解，外面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星球，把这个星球的一切看作是供养自身的对象，使其成为自己生存发展攫取的资源对象。古老的文明则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天地或自然的产物，人为天地所生，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家园，天人合一的家园。因此，我们对待天地的态度，与突然来到这个世界的外来异己者截然不同，天地或自然不只是供养我们的资源，也是与我们共生的家园。因此，理性经济人的预设有点符合外星人的预设，是一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一种人类中心的利己主义。生态文明继承了古老文明的智慧，重新安顿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确立起了天地人是相互依存的“三才”之道。

一般来说，生态文明和古老文明的价值观的契合性比较容易讲，但真正难的可能还是怎样从生态文明中创造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的模式，一种具有自主知识体系性格的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问题。所以，这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

马克思说过，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这是针对旧的社会科学而言的。社会科学的假设就是人类中心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来源于新康德主义的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及范畴先行的认识框架，具有一种方法论普遍主义的霸权，而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是实践、是历史、是现实的总体。现实不等于事实，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历史总体，包括了过去、未来和现在。这就要求，我们的知识必须是对未来负责的知识，从实践的总体性出发的知识。因此，必须创造出符合对象的方法，而不是用一种方法应对一切对象。在我看来，马克思说的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的意义就在于此，历史科学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态度和方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科学分类体系可能要有一个新的调整。诸领域之间划分形成的专门学科，需要一个以现实的人和实践的总体为前提的统合性视野，以及相应的贯通性原理。这样，从生态文明出发对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其意义就十分深远，因为这种探索沟通了古今认识论和价值论，在积极转化现有知识体系的同时，要为未来的知识体系探求建立真正的世界观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邮政编码：100732。）

不断提升创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能力

杨瑞龙

生态文明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可以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生态文明，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生态文明，还可以从法学等领域研究生态文明。而从经济学视角构建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理论基础，是非常有价值 and 非常有意义的。

目前流行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抽象掉了生态问题。基于传统工业化所形成的哲学基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基于这种传统工业化条件下的哲学基础形成了一套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逐渐形成了一套基于经济人和稀缺性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该理论在完美市场假设下，遵循个体主义成本收益分

析方法,揭示了消费者基于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行为,以及生产者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但无论是效用函数还是生产函数均不包含环境生态等变量,主流经济学均把环境生态等当作外部性来处理,即在福利经济学逻辑下依靠政府干预来解决,在新制度经济学逻辑下依靠对产权的界定来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这样一种把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并将自然当作资源攫取和废弃物排放场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显然与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现实不相符合,因此,通过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实现经济学理论创新就成为适应时代变迁的内在要求。

从课题设计内容来看,研究者提出了一条有价值的基于生态文明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逻辑与思路,那就是首先构建基于生态文明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具体路径为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类的经济活动纳入“自然安全边界”,同时扬弃物质主义、消费至上,回归“美好生活”的发展目的。继而基于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重构自主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包括新目标和约束条件下,重构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分析体系,揭示“自然安全边界”下的经济均衡条件,进而在生态文明范式下展开对应用经济学和政策的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方案看,立论基础扎实,研究思路清晰,对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把握准确,技术路径可行,推进了基于生态文明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创立。以下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如何更好地构建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出框架及建议。

第一,要提升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创立主要是基于中国现实,中国经济学不同于国别经济学,它作为一门自成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具有一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是指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而理论则是人们基于一定的研究范式,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知识的系统性结论,对人们未来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显然,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的实践密不可分。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涵就是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在继承与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吸收现有经济学分析体系中有用成分的基础上,直面我国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难点与重点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形成规律性认识,进而形成系统性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包括基于对中国实际科学认识的规律体系、基于规律性认识提炼出的范畴体系、基于范畴的累积及范畴之间逻辑关系的梳理而形成的理论分析体系、基于理论分析体系之上的一套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体系。

第二,要倡导直面现实的问题导向研究方法。直面现实不是不要理论,而是要用从现实中发现的新问题去验证与发展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对过去实践的一种抽象思维的结晶,而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随着时间、条件等元素的改变,已有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就有可能下降,而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我们是否能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去发展与创新理论。中国的改革实践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尝试前无古人,所遇到的很多难题显然很难从现成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流行教材中找到直接答案。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直面现实的分析方法,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现有的理论发生冲突时,不要一味以现有的理论否定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或经验,而是要用在实践中发现的规律性认识来修正或改造已有的理论,进而凝练出新的研究范畴与新的理论结论,形成一套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实践的理论构建。直面现实的问题导向分析方法的本质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第三,要勇于理论创新,推进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国经济学既有对已有知识体系的批判与继承,更有通过对中国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新现象、新情况的理性认识,进而揭示其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样的理论创新成果本身就是对原有理论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的突破,以及对未知研究领域的新探索。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一项需要我们付出巨大艰辛

的重大理论创新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一文中指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①。通过理论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需要扎实的理论准备，包括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全面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要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二是需要在对中国实际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抽象提出科学问题。波普尔认为，科学问题就是“背景知识中固有的预期与其所提出的观察或某种假说等新发现之间的冲突”^②；三是需要对基于实践的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炼和总结出规律性认识；四是基于规律性认识，凝练出中国经济学的特有概念与范畴；五是梳理不同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必须坚持科学精神，脚踏实地，深入实践，刻苦钻研，勇于创新。

第四，要推进研究方法的现代化。我们既要重视规范分析，也要重视实证分析；既要重视定性分析，也要重视定量分析；既要重视演绎分析，也要重视归纳分析；既要重视历史分析，也要重视逻辑分析。学术界好像有一种声音，实证分析、计量分析是西方经济的专属品，其实不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应该鼓励专门从事中国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品质，使其研究结论具有可重复性、可证伪性、可推广性，这对于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能够被更多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并扩大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第五，要充分认识到创建中国经济学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每当谈及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时候，有些人希望在短期内就能够构建出一个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媲美的成熟理论体系，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下还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全新探索，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距离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不小的距离。既然研究对象具有不稳定性，对尚在进行中的改革实践及发展进程的认识还在不断加深，在这样的条件下希望构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显然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将随着我们研究对象的不断稳定及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成熟。这其实不足为怪。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形成也是历经了漫长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成熟，西方主流经济学才逐渐成型。如果没有早期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学派的理论贡献，没有我们在经济学说史中称之为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就不可能产生亚当·斯密的鸿篇巨著《国富论》，直到马歇尔综合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原理》，西方主流经济学才基本成型。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也将会经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脚踏实地深入实际，去努力挖掘与发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背后的逻辑，凝练出新的范畴，随着直面现实的研究成果不断积累，逐渐把这些范畴结构化、理论化，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级教授，邮政编码：100872。）

①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8月16日，第16期。

② Popper, K. R.,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p. 71.